

监测边疆

中国在西藏、维吾尔地区、内蒙古和香港的数字监控项目

本报告利用基于政府和企业记录建立的原始数据集，对中国管辖的四个地区——西藏自治区（西藏/TAR）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维吾尔地区）、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和香港——的数字监控供应链进行了梳理。与二手报道或受影响者证词不同，这些数据为研究中国的监控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因为政府记录反映了政府自身的采购决策，并揭示了支撑其基础设施的企业和技术。

仅分析单一地区，无法全面反映中国数字监控体系的广泛性。虽然这四个地区并非唯一受到中国监控体系影响的地区，但本报告之所以关注这些地区，是因为监控对当地人口产生了显著影响。西藏通常被认为是中国针对少数民族进行压迫和大规模监控的早期模式，而维吾尔地区则是相关措施扩展应用的地区。这些工具和做法随后延伸至实行名义上不同法律体系的香港，同时也扩展至受关注程度相对较低的内蒙古。

中国的数字监控体系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基层社会管控，发展为由人工智能 (AI) 支持的高科技基础设施，其中包括高分辨率摄像头、生物识别数据采集以及预测性警务平台。² 中国共产党 (CCP) 的“五毒”（五毒）框架将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以及民主运动人士列为重大威胁，并为中国境内针对特定群体的监控活动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雪亮工程”（雪亮工程）等由政府主导的项目进一步扩大了针对性数字监控的覆盖范围和规模。值得注意的是，C4ADS 记录的内蒙古地区中国国家监控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监控和压迫模式并不仅限于“五毒”框架中所列的人群。然而，“五毒”认定仍然反映出北京认为对国家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人群。

中国政府记录显示，国家压迫性监控体系中反复出现以下四个要素：(1) 公安机关 (PSB) 采购监控设备，以支持国家监控项目；(2) 公安机关采用由人工智能支持的生物识别数据采集技术；(3) 与监控相关的项目由国内分销商提供，其中中国三大电信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4) 尽管美国制裁的制造商（如宇视科技 (Uniview) 和海康威视 (Hikvision)）通常并非直接供应商，但其仍是供应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报告通过各地区的案例研究，对这些模式进行了分析。

中国的监控技术能力是在利用西方技术和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内产业体系，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监控设备制造商和出口商。本报告的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国内能力不断发展，仅针对特定外国制造商实施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措施，其影响范围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这表明，有必要采用针对分销商和最终用户的其他措施，相关内容将在“建议”部分进一步讨论。然而，外国企业仍然嵌入于这一供应链之中。

通过政府采购体系，全球供应链仍可能在更广泛范围内与针对少数民族群体和政治异议人士的压迫行为产生关联。梳理这些供应链，并了解中国如何持续为其压迫性监控体系提供支持，是实现财务、法律和声誉层面责任追究的前提。要打破这一链条，必须明确针对的目标主体、各方之间的关联以及具体的运作模式。本报告识别了所涉及四个地区相关合同中列出的监控硬件主要国内供应商，勾勒了该市场核心企业的初步概览。由于本报告讨论的受美国制裁制造商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企业尽职调查以及“了解你的客户” (KYC) 标准是防止进一步与国家支持的压迫行为产生关联的重要工具。